

一个亟待重新审度的大计 ——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

AN IMPORTANT POLICY TO BE URGENTLY REVIEWED—SOME REFLECTION ON EDUCATION

本刊评论员

“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是我刊办刊宗旨，而教育在任何国家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基石，因此从《科技导报》创刊起，教育问题就一直列为重点选题。不久前，由我刊美方编委潘毓刚、谢定裕、聂华桐、钱致榕、袁休教授倡议，由美国华人科技教育协会发起，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中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座谈会。随后，我刊编辑部在国内也召开了北京地区有影响的十位中学校长座谈会。这两个教育专题会，研讨角度各有侧重，但探究所及，有广度，有深度，意义不凡。前者从全中国范围大跨度地总览了“第一中国”、“第二中国”、“第三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概况，联系国际经验研讨了中国教育的症结。后者从教育水准最高、办学条件最佳的“第一中国”十所中学近距离地观察、分析了中国教育困急的实况。将二者结合来读，给人以强烈的论证慑服力。

这两次座谈会，一在国外，一在国内。虽然参加者的身份、经历迥然不同，但他们对国家、民族兴衰所抱的关切之情却是共同的。无疑，他们的见解和呼声代表和反映了海内外广大知识阶层对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深切关切。这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中，许多是中外知名的华裔教授、学者，许多是在国内教育一线上茹苦含辛几十年的校长、教育家。因此，他们的观点和见地，从科学和求实的角度上讲，应该说是最具严肃性，最具权威性的，也应该是最受到重视，最受到尊重的。希望他们的意见在重新审度、重新决策教育问题时，能产生重大的、有益的影响。当然，我们也欢迎中外读者，将你们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切和见解写成文章，投诸本刊，参与讨论，以共同促进我国这一基石大业的发展。

这两次座谈会，以及以七届人大、政协为代表的、全社会性的对教育的关注与呼吁，有着几个重要的背景：

今年二月份《世界经济导报》关于中国近五至十年来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对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的中国“球籍”问题的警号，惊惧整个民族的心魄；

历经整顿，却每况愈下，不见收敛的官风、世风问题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心态、民族精神素质急剧下降的种种表现如蠹虫噬心，使善志良智者日感不安；

高层领导多年来虽一再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但至今尚未见根本性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教育的种种困急和隐忧，仍日趋严重，令人重负难释。

以上这几方面的深刻背景，无不使以兴国兴邦为第一忧的海内外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对国家发展的关切很自然地集中到教育问题上来了。教育立国，教育兴邦的强烈“呐喊”再一次以空前的强音，响彻于海内外炎黄胞泽之间。看来，把教育问题作为一个必须重新审度、重新决策的大计，已是刻不容缓了。

但是，重新审度重新决策教育大计的难点在哪里？为什么近年来呼声日高，却决心难下，变化不大？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当然是个重要的实际原因。但对教育问题认识、判断上存在着种种难点和障碍，不能不说是个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重新审度的难点在于——教育是否真呈危急之状？十年来教育经费翻了一番（由国家预算的5%上升到10%）；全国各层次教育体系的

重建和恢复,各种考试制度的恢复、完善;以及各级领导,各层次会议对教育的强调和重视,又常见于报端。总之,成绩明显,形势看好,何来危机?但是,海内外惊呼呐喊的,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而是担忧对长期历史失误在教育根基上造成的危机状况尚无根本对策;是指由于几十年来教育、教师未被置于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致使教育、教师实际上处于倍遭轻视,毫无吸引力,被一代代青年视为畏途的情况;是指由于长期来对教育对教师投入不足,造成当前师资队伍老化、健康恶化、后继乏人的情况;是指高、中级师范院校生源素质、献身精神诸方面每况愈下的窘急情况;是指三、四流人才进师范,四、五流人才当教师的严峻现实;是指广大地区办学条件在经费、物价狭缝中日益艰难的现状和趋势;是指由于教学的社会环境恶化、体脑劳动报酬倒挂,以及竞争机会、竞争条件由于不正之风日盛日渐失去公平原则,所引起的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涣散了教、学两方人心,弃教厌学之风越刮越盛,等等。

近十年来国家在对教育投资比例的增加方面,在大力恢复“文革”对教育制度造成的破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人所共知,人所公认的。但这些成绩尚远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历史形成的上述诸方面危急的实质状况。随着教师队伍的老化,健康、心绪方面的恶化,上述状况更日趋严重。总之,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仅作一般化的强调,采取一般化的措施,均已无济于事。对当前的教育状况,亟待从根本上重新审度,对今后的教育大计亟待重新决策。一句话,根基之危须得根治,须得治本。

其次,重新决策的难点还在于——存在着“先经济后教育”观念的束缚。由于近年来对教育问题的呼声日高,相信各级决策者对教育的难点和危急情况不是不知,只是难有所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经济后教育”的观念从上到下,有形无形地把人禁锢了,一句话,千重要,万重要,没有钱,办不了。但是,现代化的发展果真是“先经济后教育”的吗?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成功的基础教育是经济起飞的主要基石和阶梯,各国各地区无一例外。日本明治维新首崇教育、美英德法教育兴邦的早期历史姑且不论,就以台湾省近廿年来的崛起看,它的经济起飞基本是得益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优质。从60年代起,正当台湾经济起步时,台湾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连年成批涌向美国,台湾成了美国高级人才的预备学校。当年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主要依托于具有良好基础教育的优质劳动力,依托于训练有素

的中等技术人才。时至今日,台湾经济由劳动密集转向技术密集时,长期滞美的高级人才开始返回或反馈。台湾的这段历史纪实,我们必须深切注意。其实,国内近十年的开放搞活中亦有大量的事实可资证明,凡文化闭塞、教育落后的地区,不仅长期贫困,而且脱贫脱困也是最难启动,最难见效的。

另一方面,促使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其总体社会结构的合理构成,更是最高决策当局要彻底探究和策划的首要问题。从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重、轻、农”,抑或“农、轻、重”,或者能源、交通、矿产、原料与加工业之间的位置关系、比例失调的调整,再调整等等,反反复复困扰了我们二三十年,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发展速度。如果说,单就经济建设中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科学与否,客观上竟有如此巨大的促进或阻扼作用,那末,整个社会发展、社会推动的宏伟工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关系、比例关系的合理与否、科学与否那就必然要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了。

“根深叶茂”这条貌似简单的法则,实际上决定我们这棵十亿人口“大树”的生死存亡。十亿人就是十亿条根,国土、资源、自然环境就是这棵大树赖以生存的土壤、肥份。所谓“经济”,实际上就是靠这亿万条根吸收、传输、转化养份所生长出来的茂叶丰果。中国这棵大树的存亡兴衰,就看这十亿条根壮否、深否。无庸赘言,人口的教育素质,精神文化素养是根深根壮的决定性因素。根之衰,焉言树之壮?我国多少年来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率,高浪费、低收益,不正是这种弱根病根产生的必然“法则效应”吗?试想,如果决策、管理、生产、营运各个环节都是在低素质、低水平状态下运转,怎能企望产生出总体上的高效益来呢?现代有竞争力的经济更要靠各环节上大批高素质的人来促成是自不待言的了。实际上,那些早已深谙教育立国、兴国之道,深受其惠的先进国家,在筹划各自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计谋时,亦首先审度他们的教育状况。美、日目前亦在惊呼他们自己的教育危机,唤醒他们自己民族的忧患意识,正在悉心谋划各自的教育改革。他们一如既往,在企划国家未来发展目标时,首先制定出全面的社会发展指标,再配以相应的经济指标作为实现社会指标的手段。而社会指标中教育往往是突居其首的。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似乎仅有翻两番、人均收入等粗线条的经济指标,尚未见有全面体现我国现代化特征的社会结构构成及相应的社会指标。由此可见,全面审度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综合结构的框架,重

新审度教育在这一结构框架中的地位、作用，重新作出相应的决策，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当然，教育与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两者关系上采取任何绝对化的偏颇态度都是不妥的。但那种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狭义地理解为经济压倒一切，一味只抓经济，只抓翻番，这种战略上单打一的作法，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遍及全国的短期行为，短期心态必须及早匡正，不然其后果，比之以往那种经济内部产业比重失调要严重得多。这种社会结构框架失调的后果不像产业比例失调那样可以在几年间得到调整，它势将接连几代人地长期困扰我们民族、国家的发展。

教育问题重新审度、重新决策的第三个难点是——教育指导思想上的“人才与普教”，“重点与一般”，亦即“人才培养与人口素质”，或称之“独木求才”抑或“茂林生材”的决断问题。

现代化建设确实需要一批批各种领域的拔尖人才。是采取从小就选苗拔苗，重点培育，还是在普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调整教育结构的基础上让普材丛生，让广大青少年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各有机会显现才能，出类拔萃？这是个需慎重研究的大课题。近十年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为主干的这一系统培养出一批批人才，其数量比过去历年多，其质量在理论基础、知识方面比历年好，缓和了“文革”十年的人才断层。从这方面看，教育确实成绩不小，形势很好。但也不能不看到恰恰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正隐藏着严重的问题。这种席卷全国的“重点热”，使基础教育被扭曲为单纯为升学而教，为升学而学，在多少学生、家长的心目中，升学（以至于出国）成了压倒一切的要义。这种重点定终身，人人争夺“独木桥”的情况不仅过早淘汰、淹没了大批大批有潜力的可成之材，而且导致死读书，读死书、高分低能的普遍情况；导致了广大非重点学校学生厌于学，教师疲于教，以至弃学弃教现象的大量发生；同时也导致教育中只重知识灌输、轻品德教诲的只教书，不育人倾向，致使广大青少年在人生观、人品基本素养形成、定型的关键阶段，普遍失教失海。以至什么尊师敬学，什么尊老爱幼，什么事业理想，什么自持自尊，什么公德公益，什么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什么向心力、凝聚力，在一代代青少年心目中，越来越变得淡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前途，主要要看后一辈、后几代能否超过前辈、前代。而教育若只抓重点，但求“升学”，只讲出人才，忽略了基础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历史后果终将若何？

最后，第四个难点——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办学经费，以及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物质待遇（特别是住房），是靠国家、社会保障，还是靠学校在教学重担下再去与专事经营的各行各业搞竞争，求生存？抑或靠教师去自我奋斗，开辟第二战场、第二职业谋求改善？

无疑，国家通过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条件，那么，一切企业，一切企业性质的部门、单位，皆可一显身手，各有神通，他们生财、集资、融资手段多多，对企业生产的自身发展它们自有办法，自有手段，各有千秋。国家、政府大可不必花大精力，花大投资去介入，去参与。倒是那有限的几项关系国家民族全局的基础性事业，国家、政府是非得要下大力，投大资的。教育，与其他全民性、社会性基础事业（例如基础科研、城市、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等等）一样，其本身是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民族的不断发展准备条件、创造条件的。它们本身不一定都能直接生财生利，但国家却靠它们大生大益。国家、社会的根基元气，就靠这些基础事业滋润、生津，补益后劲和底蕴。因此国库及各级政府财政，倒应该将其大端投入这些基础事业上去，成为这些基础事业强大的后盾。如果说，在教育系统内部，在各学校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引入经济法则，使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并由此自然形成一批优质、著名学校当然是有益的，但是让中小学，让校长、教师去参与社会的商品市场竞争，无异于让他们赤手空拳地去与全副武装的对手作生死搏斗。很明显，其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当然，正常的“勤工俭学”应该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育人、育才都有重要价值。但将“勤工俭学”企望为学校、教师办学、从教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这对广大的一般中小学校，肯定是勉为其难的，它对教、学风气的不利冲击，肯定是严重的。

当然，对教育问题重议大计，重布大政是一项重大国策的调整，必须慎之又慎。鉴于对当前教育基本情势认识上尚有重大歧见，因此，我们郑重建议，是否可从中央到省市，由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教育委员会主持，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及各省分院，会同当地有代表性的中小学、大学的校长、教师们，自己推举出若干名社会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共同组成基础教育调研组，各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深入到教学最基层，对各自省市的教育实况，实质性的症结性问题，以统一规范的格式，将数据资料、人、事实例整理出报告，并提出最终分析、结论报告。全国人大、政协亦同时聘请若干教育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组成专门小组收集、（下转42页）

本得到继承和光大。日本经济起飞的两只翅膀就是家庭、社会和谐和民族精神素质。乔龙庆女士实际上讲的是伦理的实际含义,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多年来讲精神文明建设,现在终于对青少年提出了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更具体,更实在和最基本、明白的道德准则。可以预见,中国国民素质改观之日当不在远。

当有人问到教育的好处是什么时,柏拉图回答得很简单:“教育能出好人,好人品行高尚。”美国的教育家们认为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青年个性发展的重要阶段。所有社团机构中唯有大学创造了影响无数学生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天地,在这里他们的个性和价值观念得以塑造成形。因此校长的工作再忙,教授的业务再专,也要责无旁贷地帮助学生理解怎样走向有道德,有思想,充实的人生道路。

应该指出,如果不深入了解美国,很难体会到以上所论只是理想化地,至少说是理论化地在谈教育。且不论别的学校,即使在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美国学生的利他主义观念至为淡薄,常有损人利己的行为在我身边出现。当我与一位台湾

同学谈及这种现象时,她说,“还是咱们中国人,处处先为别人着想,他们美国人老是自私自利。”或许,这里的人们不易挣脱西方人生哲学的忧虑,他们悲观厌世,庸庸碌碌,而我们中国哲学却乐天知命,富有豁达的进取精神。

※ ※ ※ ※ ※

蔡元培先生1922年作为北大校长访问欧美。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蔡校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跟中国留学生讲,学一门专业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到科学方法。“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这番话海外学子当奉为座右铭。若论条件,中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美国是无法比拟的。而我国的教学设备(硬件)和管理方法(软件)的相对落后更加强了我们的责任感而发愤学习。

我热爱祖国,这番热忱生根于小学,萌芽于中学,蓓蕾于大学,开花于海外——花期可真长,更待归国结果。我记着爱国华侨沈己尧教授的话,“留学当报国,及时回故乡”;更不忘父母的叮嘱,“为家争气,为国争光”。

此文谨献给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上接5页)

整理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从中分析、归纳、总结出各先进国家在它们发展过程中教育、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在以上两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就可以较为客观,较为科学地对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作出判断,并提出相应的调整决策的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议决。当然这种专家集团,亦可保留,常设为各级教育问题决策上有权威的咨询参谋集团。

希望教育问题的重新审度、重新决策,能成为我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范例。相信这也是当前广大海内外知识层中满怀热望,翘首以待的一桩牵心大事。

倘若,教育问题终得重新调整决策,则本期

刊出的海内外两个座谈会上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亦不失为可行的选择:

●在大力扩充、健全师范教育体系(这是最根本的)的同时在全国逐步推行法定的“师役制”,以作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解决长年短缺数百万教师压力的一个补充性的权宜措施。

●倡导社会(包括集团、集体、以至私人)兴学、办学,意在普及,意在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标。

●不妨研究、参照美国的办法,以教育立法方式定下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法定比例。(例如:分别为15%、20%、30%等),以求彻底改变教育经费只由中央财政负担,各地只是照转分拨,不挑教育担子,甚至非法侵占、挪用教育经费的情况。